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THOMAS HARDY

哈代学术史研究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omas Hardy Studies

聂珍钊 刘富丽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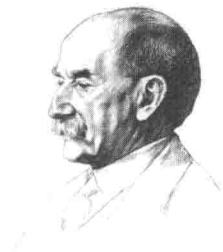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语

陈众议



哈代学术史研究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omas Hardy Studies

聂珍钊 刘富丽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代学术史研究 / 聂珍钊等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8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4227-6

I. ①哈… II. ①聂… III. ①哈代, T. (1840~1928)-
人物研究 ②哈代, T. (1840~1928)-文学研究
IV. ①K835.615.6 ②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2232 号



书 名 哈代学术史研究

作 者 聂珍钊 刘富丽 等

责任编辑 方 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4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227-6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以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

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有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

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

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

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

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

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绪言

这部关于哈代学术史研究的著作是陈众议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子课题。几年前,在陈众议先生领导下,“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正式启动,我承担其中哈代学术史研究部分,深感荣幸。从事哈代的学术史研究,既可以对当前国内外哈代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也可对自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哈代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我希望借此能够对中国的哈代研究有所启示。

无论是对哈代的学术史进行研究,还是对其他作家的学术史进行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国的学术创新十分重要。“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通过对一批经典作家作品的解剖,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其经典形成的过程,以为今天的借鉴。从根本上说,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强调以及对学术研究价值的追求。学术史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的体现,而学术史梳理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陈众议先生撰写的总序说得好:“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文学研究抑或其他学术研究,都需要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这既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一种基本的学术规范。不了解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学术研究历史,不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不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批评、借鉴和吸收,不了解前人的研究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提出,我们就会短视、近视、盲视,

陷入主观主义。学术研究切忌管中窥豹,将自己束缚在一个有限的学术小圈子里,进行所谓的自我解构,自说自话,自以为是。然而在目前一些学术研究中,短视现象并不少见。陈众议先生的这些见解,正是我们从事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出于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陈众议先生认为对西方理论的系统反思、分析和批评势在必行,而借助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除了可以重新唤醒人们对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正确认识之外,也同样有利于我们逐渐尝试构建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改变以往照搬国外的理论多、自己原创少的历史。“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提出和实施既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我国学术现状的反思以及对未来学术研究如何发展的探讨,尤其是对学界不良风气的拨乱反正。在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写作的总序中,陈众议先生言简意赅地阐明了社科院支持的这一重大项目的宗旨:“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显然,“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将会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英国文学史上,托马斯·哈代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不仅被誉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而且也被看成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哈代一生跨越两个世纪,他是19世纪英国小说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20世纪英国诗歌的奠基者。哈代有如处于旧时代和新时代交叉点的意大利诗人但丁一样,他用自己创作的小说和诗歌把两个世纪连接起来,他是英国文学长河上的一座桥梁,19世纪英国文学传统借助他的创作进入20世纪的英国文学,从而得以延续而不断裂。他的作品犹如一艘艘帆船,读者乘坐着它们可以饱览英国南部农村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思考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种种问题。哈代及其创作的魅力是永恒的,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他都不会被人忘却。

早在20世纪20年代,哈代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但是对哈代的全面系统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才真正开始。从80年代至今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哈

代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遗憾的是,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哈代研究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为了把哈代的研究推向深入的层次,现在是对哈代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和总结的时候了。

在世界文学史上,哈代是与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著名作家齐名的人物,因此要对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哈代研究的大量成果进行研究和总结,实非易事。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做出努力,希望借助我们的工作对中国的哈代研究有所推动。哈代学术史研究由“哈代学术史”、“哈代学术史研究”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重在从历史的维度对哈代各个时期作品的研究历史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哈代及其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展开研究,第三部分是重要文献及索引。关于本书的内容和评价,各位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会有自己的主见和评价,无须我在此赘言。我需要说明的是,本人从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一直对哈代有着浓厚兴趣并展开研究,希望借此机会对自己的哈代研究进行一次总结,但由于自己身体方面的原因,无法承担全部研究任务,所以邀请了其他研究者共同完成。

这本书的具体分工如下:王晓兰(第一编第一章),徐江清(第一编第二章),易立君(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第三节),黄晖(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刘富丽(第一编第四章),邓年刚、聂珍钊(第二编第一章、第二章),徐艺玮(第二编第三章),王晓兰、聂珍钊(附录)。刘富丽做了大量组织与汇总等工作。聂珍钊最后对全书进行统稿,对某些部分的结构做了较大调整,重写了某些部分。以上合作者都能做到认真负责,齐心协力,为全书的顺利完成做出了贡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做好哈代学术史研究的工作,本书的各位作者都做出了努力,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憾,在此诚恳请各位同行与读者批评指正。我国拥有大量哈代的忠实读者,吸引着大量研究哈代的专家,我相信,在各位的关心、支持和参与下,我国的哈代

研究一定会继续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最后需要特别感谢的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先生。作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他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是难以言表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吴晓都先生、吴岳添研究员以及外文所其他同志，都给予了本书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聂珍钊

1	绪言
1	第一编 哈代学术史
3	第一章 平凡的启程
3	第一节 创作的种子
15	第二节 初涉文坛
28	第三节 锋芒初露
39	第二章 最初的成功
39	第一节 最初的成功
65	第二节 罗曼史小说
93	第三章 悲剧小说
93	第一节 《还乡》
105	第二节 《卡斯特桥市长》
114	第三节 《林地居民》
126	第四节 《德伯家的苔丝》
138	第五节 《无名的裘德》
150	第四章 诗歌创作
150	第一节 早期诗歌
159	第二节 中晚期诗歌
170	第三节 史诗剧《列王》
181	第二编 哈代学术史研究
183	第一章 哈代小说创作纪事
183	第一节 历史背景
188	第二节 早期小说创作

193.....	第三节 中期小说创作
199.....	第四节 晚期小说创作
209.....	第二章 哈代的学术思想
209.....	第一节 哈代的进化向善思想
218.....	第二节 哈代的哲学思想
225.....	第三节 哈代的伦理思想
232.....	第四节 哈代的文学思想
241.....	第五节 哈代的悲剧思想
257.....	第三章 哈代在中国
257.....	第一节 哈代小说在中国的译介
263.....	第二节 哈代诗歌在中国的译介
267.....	第三节 中国的哈代小说研究
284.....	第四节 中国的哈代诗歌研究
295	附录一 重要文献
329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336	附录三 书、报、刊、篇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